

第五讲 长征是永恒的英雄史诗

导入

音频：《七律·长征》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政府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是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首七言律诗作于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流传甚广。毛泽东史诗般地再现了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歌颂了红军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纵观全诗，气势磅礴，气魄宏伟，格调高昂，笔力雄健。不仅大处雄浑，节奏强烈，而且小处精细，抑扬顿挫。诗中对仗极为工整，用词极为精妙。全诗对张牙舞爪、穷凶极恶的敌人不置一字，视之若无。这种傲视山川的夺人之气，非百战百胜、总揽全局的三军统帅、一代伟人而不能拥有此胸怀，无此胸怀亦不能出此语。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被迫长征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				
次序	国民党军队	中央红军	人数比例	反“围剿”的结果
第一次	10万	4万多	约2.5：1	胜利
第二次	20万	3万多	约7：1	胜利
第三次	30万	3万多	约10：1	胜利
第四次	30多万	7万多	约4：1	胜利
第五次	50万	8万多	约6：1	失败

这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已有八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 and 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5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了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红七军团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我们党在红区的力量损失了90%，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进行长征。

思考：中央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

红军只有不到十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 1934 年 5 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10 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30 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从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4 月）。

八七会议后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党委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1927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以“左”倾盲动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遭到失败。12 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 1928 年三四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第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 年 6 月至 9 月）。

1930 年 6 月，因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以李立三（宣传部长）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 月 1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他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但结果损失惨重，先后有 11 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损失惨重。1930 年 9 月 24 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

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接受进一步检查。

第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低估了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号召全党准备决战；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指挥下，“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严重“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受到排挤。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包括：

第一，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第二，从社会根源上来说，中国社会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少，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而党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幼稚病”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往往主观片面，在政治倾向上易于左右摇摆，遇到问题容易走向极端。党内连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第三，从以往纠正错误的方法和结果来看，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纠正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方法有缺点，太着重个人责任，只注重组织处理，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四，从外部因素来说，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并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盛行，最终把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情绪推向了极致。

二、悲壮之师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命令湖南军阀何键调集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26个师30万兵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伤亡巨大，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并由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共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及由其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全权指挥，军事上走的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动进攻，夺取中心城市，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不顾红军兵力弱和装备差的实际，排斥游击和运动战。红军虽然最后渡过湘江西进，但其惨烈牺牲，不得不让全党上下和红军开始思考军事指挥问题。它既标志着形式上的“三人团”最高权威的

盛极而衰，也标志着实质上的两人决策核心名存实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广大红军干部逐渐觉悟到，湘江战役的巨大牺牲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觉醒、觉悟的重大转变。红军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为之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想基础。

三、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面对红军队伍的大减员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党中央领导层围绕中国革命军事路线、战略方针转变先后召开了通道、猴场、黎平三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和作战方针，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成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保证了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通道会议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军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会议。失去红军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受周恩来邀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计划，应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二是列席会议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困境作出的调整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力求说服博古等领导人。毛泽东的见解卓越非凡，他在中国革命的内外交困之际，再次展现出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他的转兵主张更是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与支持，但李德、博古等人仍坚持原定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未能对战略转移大方向作出决定。会议结束后的当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实现了从北上到西进的“转兵”。

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上，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为随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准备，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开强敌，既避免了红军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和消耗，又为红军赢得了相对喘息的时间，更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开了正确的第一步，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按照之前的军事计划，部队还是要向湘西转移。通道会议虽然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进军贵州，但未从军事战略、组织领导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性转变，黎平会议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召开。这也是中央长征以来召开的首次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

与会者激烈争论了红军进军路线问题，首先发言的是博古，他始终认为共产国际同意的决定，不能打丝毫折扣，所以一定要进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红军应改向黔北进军，在黔边地区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从而彻底放弃原来的行军方向计划。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非常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在转变战略决策上，黎平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被采纳和执行。博古、李德等人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被否定和停止。黎平会议之后，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中革军委立即转发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其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同时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12月19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将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地区中心遵义方向前进。

黎平会议作为长征以来首次党内最高级别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真正结束了自1931年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严重受排挤和被边缘的状况，一个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崭新领导局面开始形成。

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为确保黎平会议制定的军事路线能正确实施，纠正博古、李德错误影响，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和伍修权（翻译）等人参加，博古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毛泽东则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放弃这一念头，并做了详细说明，此时再回兵湘西已无可能，前面有乌江天险，后面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左侧有跟贵阳交界的清水江，实际上彼时的红军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三角形地带。

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发展和完善了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根据地、转兵贵州、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北渡乌江向遵义方向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

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主要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长征途中，军事路线不仅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制定正确的战略作战方针是中共领导层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均紧紧围绕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在思想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作出的各项行动与决策，都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猴场会议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案例：强渡乌江战役

强渡乌江战役，从1935年1月1日起开始发起攻击，至1月3日红2师4团在江界河突破乌江防线，到1月5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3万多人马全部过江，历时5天，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俘敌人500余名，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乌江，因江水清绿而得名，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省，把贵州划分为南北两部，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00多米，水深流急，不易泅渡；南北两岸都是峭壁悬崖，巨石高耸，突兀云端，十分险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调整部署，以20万大军紧追。国民党的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听说红军已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包围，进入黔东，大为恐慌，立即调兵遣将防守黔北各县，特别是乌江北岸沿线，妄想凭借乌江堵住红军。

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一军团第二师奉令由江界河渡口附近强渡乌江，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渡江。接受任务后，指战员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向乌江进发。

以耿飚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红二师四团是前卫团，担负偷渡和强渡的任务。他们迅速逼近了江界河渡口，准备渡江。据当地群众说，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大木船；第二，必须是大晴天；第三，要有熟悉乌江水的好船夫。可是，这时渡口边别说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国民党军搜走了。船渡、架桥都不可能。

前卫团的同志清楚地知道渡江的意义。对于红军来说，如果不迅速渡江，就有被迫与敌背水而战的危险。为了弄清敌情和地形，部队派出几名侦察员进行了化装侦察，得知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渡口上游500米处，有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能攀登上下，敌人没有派兵防守；其余各处均是无法通行的绝壁悬崖。

于是，师领导决定佯攻渡口，主攻乌江上游的羊肠小道。与此同时，工兵连加紧砍伐竹竿，赶制竹筏，作强渡和架桥的准备。部队还从各连挑选了善于游水的18名指战员作为

突击队员，准备泅渡过江，驱逐敌人在江边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1935年1月2日，强渡开始。这天冷风飕飕，细雨霏霏。上午9时，渡口大道方面的佯攻作战开始了，部队还边打边向渡口边搬运架桥材料，表示要在此处架桥。不出所料，敌人果然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红军射击。正当佯攻方向打得激烈时，红二师第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红色勇士，在机关枪、迫击炮等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每人背一支驳壳枪，跳进寒冷刺骨的江水中，向对岸游去。他们冲破惊涛骇浪，在十几分钟后成功到达对岸，隐蔽在江边的石崖下。可惜8个勇士携带的一条准备架桥用的粗绳索，却被敌人的炮弹打断而未能拉过去。

根据这一情况，前卫团决定继续以竹筏强渡。可是，竹筏刚划到江心，就遭到敌人的射击，翻掉了。已经登岸的8名勇士因无后续部队接济，只得又返回于南岸。第一次强渡，遂告失败。

前卫团接受了第一次强渡失败的教训，决定夜晚实行偷渡，以避免敌人射击，减少伤亡。2日黄昏后，担任偷渡任务的第四团第一营，静悄悄地集结在江边。按照指示，5个人首先登筏，到达对岸后用手电筒向这边示光，以表示到达，在等齐一排人之后，才能开始向敌警戒线袭击。偷渡的命令发出后，第一筏4名战士在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下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没有动静，看来没有发现。第二筏又接着往江中划去。可是，20多分钟过去了，对岸还不见有手电光显示，第一筏是否已经成功靠岸，无法得知。1个小时后，第二筏的5个战士沿南岸返了回来，原来是因为水流太急，黑夜里又摸不清方向，竹筏划至江心就被冲下两里许，好不容易才沿着南岸摸索而回。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筏的命运如何更难判断了。第三筏又勇敢地发起了冲击，但划至江中，无法再前进，不得不折回。到这时，第一筏毛连长他们仍无消息。这次偷渡行动只好停止。

3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赶到前卫团，向师、团领导讲明敌人追兵已离这里不远，军委要求前卫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遵照军委指示，前卫团决定把这次强渡的任务交给第四团第二连。团政委杨成武亲自来到第二连，作了紧急动员。他说：“二连有着光荣的战斗传统，你们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坚决、勇敢地打下去。为了保证主力红军能顺利地到达抗日前线，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打过江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全连指战员以“坚决突破乌江”的响亮口号声，表达了战斗决心。

上午9时，强渡乌江的战斗又开始了。红军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在渡口上游实行强渡。第一批3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冒着严寒，赤着膊，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

3只竹筏拼命向对岸划去。当竹筏距敌人约50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敌人工事里打，这是怎么回事？

仔细一辨，这声音是从对岸石崖边传来，并隐约可以看见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敌人慌了，他们几乎乱了阵脚，枪不知朝哪里放。

这时，红军的竹筏乘隙加速前进，筏头激溅起一簇

雪白的浪花。竹筏上的同志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像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敌人在轻机关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死的死，伤的伤。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纷纷向后逃窜。

不一会儿，竹筏靠岸了，勇士们吹响了嘹亮、激昂的冲锋号。

崖底下的几个人到底是谁呢？原来，这几个人便是在刺骨的冷风中，在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连长他们。2日晚上，他们乘坐第一个竹筏摸黑靠上了对岸，上岸后等待后续部队，却一直不见人来。这时，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正在那里修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或是划火柴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第二天拂晓，他们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了出来，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强渡。

第一批强渡的同志与毛连长他们会合后，第一营的其他同志坐上剩下的几十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在密集的火力配合下，第一营过了江，迅速占领了高地。

此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增援了上来。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第一营被迫退守江边。

在此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真是身手不凡，连打了4发迫击炮弹，全部命中目标，顿时躺倒了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红军部队乘势发起猛烈进攻，完全控制了对岸。

这时，工兵连抬起几十只竹筏涌向江边，把竹筏抛入江中，拉绳的拉绳，撑篙的撑篙，迅速架起了一座浮桥。

红二师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也踏着浮桥过来了。毛泽东站在江边，凝视着一泻千里的乌江，深情地倾听着战士们在战斗胜利后的欢呼。

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乌江。

强渡乌江的胜利，使红军把“追剿”之敌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

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当时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视频：《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四、四渡赤水革命战争的神来之笔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精简，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这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

中央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军仍然判断我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我军分进合击。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

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遵义战役历时 5 天，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 3000 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极大地鼓舞红军的斗志。

三渡、四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于 3 月 2 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 3 月 16 日至 17 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 3 月 21 日晚至 22 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 120 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 5 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

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为 3 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 40 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过去那种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案例：毛泽东为什么称四渡赤水是他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它也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

化被动为主动，一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调集了湘军、川军、滇军和

嫡系中央军部队约 40 万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而红军只有 3 万多人，双方在兵力、装备上对比悬殊。可以说，红军又到了存亡关头。

为摆脱危局，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最初准备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此，1935 年 1 月 28 日，红军在土城与尾追的国民党军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战前敌情侦察有误，战斗陷入僵局，敌人援军又蜂拥而来，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怎么办？撤！

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提出放弃原定渡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向西渡赤水河实施机动，由此便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从 28 日当晚至次日凌晨，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国民党军外，主力部队轻装一渡赤水。这一行动，显示了毛泽东善于从不利战局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的指挥艺术。

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 2 月 7 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

避实击虚，二渡赤水

2 月 9 日，红军在滇北扎西地区集结并进行了整编。此时，由于国民党军各路纷纷向川、滇边境地区急进，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毛泽东抓住战机，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于 2 月 18 日至 21 日二渡赤水直指黔北。

2 月 24 日，遵义战役序幕拉开。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5 天内，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 8 个团，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声东击西，三渡赤水

红军再占遵义，让蒋介石感到奇耻大辱。他急飞重庆坐镇指挥，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敌变我变。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战，引诱更多国民党军前来围攻。当各路国民党军云集而来时，3 月 16 日至 17 日，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西进川南。为在运动中调动敌人，红军故意在白天渡河，并大张旗鼓地行军。

乘隙而进，四渡赤水

国民党军听从“调动”，调整部署再次扑向川南。鉴于调动敌人的目的已经达成，毛泽东决定乘敌人新的合围将成未成之际，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诱敌西进，而真正的主力却于 3 月 21 日晚至 22 日，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从各路敌人间隙中穿过，四渡赤水。

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攻占遵义，于是急飞贵阳督战。而红军却乘虚一路向南急进，顺利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下慌了

神，急调滇军入黔“救驾”。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迅速挺进云南。

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境内后，大造进攻昆明声势。为保昆明，国民党军被迫调整部署，从滇北和金沙江紧急抽调兵力回防。岂料，红军攻昆明是假，渡长江北上是真，用的还是声东击西之计。

“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

乘敌金沙江南岸防御薄弱之机，毛泽东立刻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以强行军昼夜急进，全军顺利抢渡金沙江，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扭转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一次军事行动，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为实现北进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符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战役期间，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进一步确立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丰富和发展

与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依托根据地指挥作战不同，四渡赤水作战，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突出的特点是发挥红军徒步快速机动的能力，“走”“打”结合：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在数十万敌人之间飘忽往来，主动创造和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视频：《“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胜利。这次战役使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五、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省石棉县，准备渡过大渡河。而国民党军也在这里布置了重兵，企图凭借大渡河的天险，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为了打破敌军的封锁，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受命强渡大渡河。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千米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当晚，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占领了安顺场。

5月25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再加上孙继先自己，就是著名的“十八勇士”。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红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

中央红军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冒着大雨，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敌人在东桥头构筑了工事，并用重机枪、迫击炮不断向西桥头射击。危急关头，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向对岸冲击。三连连长王有才带领全连紧跟突击队，除携带武器外，他们每人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突击队22名勇士在枪林弹雨中攀索前进，速度越来越快。接近桥头时，对岸工事中的敌人被红军勇士的无畏气概震慑，纷纷掉头逃命。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成功夺占泸定桥，为红军摆脱险境杀开了一条血路。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

视频：《飞夺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红四团飞夺泸定桥，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红军主力由此跨越了天险大渡河。这次胜利充分彰显了红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粉碎了蒋介石借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企图，

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动和取得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毛泽东对此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六、在无比艰难中征服雪山草地

1935年6月，强渡大渡河不久，红军即向懋功地区挺进。为甩开追在身后的敌人，迅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中央红军决定，选择敌人较少的雪山草地一线，达到快速行军目的。6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锋团，准备翻越这座主峰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

夹金山又名“甲金山”，藏语称为“甲几”，意为很高很陡的意思。地势陡险，山峰连绵，山巅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民谣称：“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更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1935年6月12日拂晓，先遣队开始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翻越雪山，向夹金山顶爬去。从6月12日到18日，历时七天七夜，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县）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此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战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

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

案例：过雪山草地：铸就长征的不朽丰碑

“红军长征举世鲜，铁流夜过党岭山；巍巍群峰银龙舞，英雄大战鬼门关。”（李布德少将《夜过党岭山》）

“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张爱萍将军《过草地》）……

红军长征，如果把每支部队的行军里程加起来，总共有8万里，而在四川的里程最长。

过雪山草地无疑是红军长征最为艰苦悲壮的时候。据我们的统计，红军在长征途中所翻越的雪山有73座之多，这里的雪山是指垭口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4000米以下的都没有算。其中，在四川境内有67座，云南有3座，甘肃有3座。

从整个红军来说，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1935年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翻越的红军棚子雪山，位于四川阿坝州茂文县境内的松坪沟。红军棚子雪山以前没有名字，就是因为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搭了一些窝棚，后来老百姓就把这座雪山叫作红军棚子。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之后，就西进岷江流域，占领了北川河谷及茂县地区。翻越红军棚子雪山是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并与之会合。

红军翻越第二座雪山是在1935年6月，由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翻越的理县和懋功县（现小金县）交界的虹桥山。红军翻越的第三座雪山是鹧鸪山，第四座雪山是夹金山。而仅就中央红军来说，共翻越了5座大雪山，其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

在所有红军翻越的雪山中，由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从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到巴塘途中的藏巴拉山是红军长征翻越过的最高雪山，其垭口海拔为4904米。

尤其震撼的是，红军在极度疲惫和饥寒的情况下，创造了连续4天翻越决益涅阿、伊则涅阿等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夹金山，3次翻越亚克夏山、梦笔山、打鼓山等4座雪山。

红军是在没有路、没有粮、没有衣物和“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入雪山草地的。很多战士都来自南方，雪域高原六月天还在下雪，加上高原反应、极度疲惫、没有衣服穿和严重缺粮等因素，导致很多战士都没有挺过来。

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恢宏史剧，过草地就是即将胜利前的英勇悲壮一幕。

1935年8月，红军决定北上。8月21日，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由于四川草地海拔较高，天气变化快，大雨、冰雹的情况随时都会遇到，除了战士饥寒交迫和极度疲劳外，更令红军担心的是遍地都是危险的沼泽。

部分红军一共过了3次草地。第二次比第一次过的草地路程更远。第三次过草地路程更长、时间更久，牺牲的人更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粮，野菜、皮带都被吃光。第三次过草地时，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总计5万多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部队分三路北上。若尔盖色吉坝、年朵坝等草地红四方面军3次经过。

由于极度饥饿疲劳，当年很多战士在即将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县班佑村时，眼前20米左右宽的班佑河再也无法跨过，800多名战士就长眠在了河边。而过了河就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够活下来。当时，已经越过班佑河的彭德怀还派了一个营去，打算将他们背过河但是到了一看，发现这800多人基本都已经牺牲了。为纪念这800多名战士，后来在班佑村修建了一个纪念碑。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有8万多人，但经过南下战斗及雪山草地，最后只剩下了4万多人，可见雪山草地的严酷。

现在说到过草地的困难，很多人不信，不相信草地会陷人。现在的红原、若尔盖草原因为气候变暖、20世纪60年代开沟排水、过度放牧等影响，水分都蒸发了，自然今天看到的草原与过去大不相同。

红军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靠的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胜利，而这种精神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七、万里长征大会师创造人间奇迹

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先后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

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1935年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兵力减半，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国的张浩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

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表示，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小结：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党领导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以非凡的智慧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